

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

余治平 著



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

余治平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 / 余治平著.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458-0713-4

I. ①董… II. ①余… III. ①《春秋》—研究 IV. ①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54704 號

責任編輯 馬麗娟

封面設計 鄺書徑

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

余治平 著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印刷 上海葉大印務發展有限公司

開本 889×1194mm 1/32

印張 12.75

字數 250,000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713-4/ K · 102

定價 38.00 元

目 錄

引言.....	1
---------	---

甲卷

《春秋》大義與“六科十指”.....	8
一、《春秋》種種.....	9
二、作《春秋》、修《春秋》.....	12
三、君子與孔子.....	16
四、春作秋成？.....	19
五、知我、罪我.....	25
六、撥亂世，反之正.....	28
七、三傳長短.....	32
八、六科.....	43
九、十指.....	61
十、“三科九旨”之說.....	111

乙卷

董仲舒《春秋》法統之辨證與闡發·····	119
一、孔子改制的禮法資源·····	121
二、三代雖殊制，其道則一貫·····	129
三、素、文或素、青·····	136
四、質、文·····	139
五、忠、敬、文·····	146
六、忠、質、文·····	158
七、王正月·····	167
八、黑、白、赤三統·····	177
九、《春秋》當新王·····	185
十、四法·····	199
十一、“四法”感應·····	213
十二、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	217
十三、漢德建構之虛實·····	225

丙卷

《春秋》屬辭比事與董仲舒之辭法研究·····	232
一、孔子辭·····	234
二、辭有意·····	236
三、正名、嫌不嫌·····	246
四、辭窮、不辭當辭、我辭·····	250
五、君子辭·····	255
六、“大之”之辭·····	261
七、非常辭·····	268

八、微辭	286
九、董仲舒的《春秋》辭法(一)	291
十、董仲舒的《春秋》辭法(二)	299
十一、董仲舒的《春秋》辭法(三)	306
十二、董仲舒的《春秋》辭法(四)	312
十三、董仲舒的《春秋》辭法(五)	326
十四、董仲舒的《春秋》辭法(六)	341
十五、董仲舒的《春秋》辭法(七)	348
附論一	
董仲舒與武帝尊罷案	358
附論二	
董仲舒的祥瑞災異之說與讖緯流變	377
參考書目	393
主要檢索	398

引言

記得當年我寫博士論文《唯天爲大》，之所以選題於董仲舒，僅僅出於我的一個單純的想法，那時候只覺得他的著作流傳下來的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9年推出“諸子百家叢書”，其中就有根據聚珍版而影印的一個小冊子——《春秋繁露》，看起來很薄，只有一百零二頁，即使加上《漢書·董仲舒傳》的所有內容，也沒有多少閱讀量，便於死扣，來自文本、文獻的壓力或許會輕一些，詮釋起來也可以自由發揮，不像那些著作等身的哲學家們僅憑浩繁卷帙就足以讓後人敬而遠之、望而卻步。

然而，一入董學深似海，慢慢地我便發現，我當年那個想法是何等天真、可笑。一方面是因為這其中隱隱地綿延著一根長長的詮釋階梯和閱讀鎖鏈：要讀懂《春秋繁露》，就必須先讀懂《春秋》經，《春秋》經總共纔一萬八千字左右，看似輕薄，實則難啃。要讀懂《春秋》經，則起碼又必須先讀懂《公羊傳》。要讀懂《公羊傳》，甚至還必須先讀懂《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特別是《春秋左傳》，離開它，讀《公羊傳》則經常不知其所云；而離開三《傳》，《春秋》幾乎就是一部天書，今人根本就無法理解。而要讀懂《公羊傳》，則又必須先讀懂漢代何休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要讀懂漢代何休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則又必須先讀懂唐代徐彥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疏》；而要真正讀懂何休、徐彥的注疏，又離不開無數後世學者解釋《春秋》經傳的著作，包括杜預、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今存於《四庫全書》和《續修四庫

全書“經部”中的許多著述，如胡安國的《春秋胡氏傳》，孔廣森的《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劉逢祿的《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王闕運的《春秋公羊傳箋》，以及當代學者段熙仲的《春秋公羊學講疏》等。而當進入董仲舒本人的思想領域時，則又必須先讀懂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甚至還得借助於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實際上，研究董仲舒，其閱讀量和理解難度遠超過研究其他任何一位思想家或哲學家。

而另一方面，則因為經學就是經學，根本容不得任意發揮。讀經學，甚至就只能是死讀書、讀死書。詮釋《春秋》、解讀《公羊傳》，必須具備足夠的春秋史知識，而不能遊離出最基本的歷史真實作天馬行空式的純粹思辨。形而上學在經學研究領域，幾乎沒有任何市場。孔子作《春秋》，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顯然是在刻意回避抽象化、理論化的哲學敘事，而寧願把進退褒貶、譏刺誅絕之王道大義一一寄託於具體確鑿的歷史事件之中。《春秋》一書跨越魯國十二王，攬盡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史，涉及人物無數，其事、其文都有根有據，有板有眼，步步緊扣，根本容不得讀者隨心臆想、蔓延曲解。《春秋》雖篇幅短小，但其內容與所含旨意卻高度凝練，孔子惜墨如命，字字有含義，句句有所指，行行藏玄機，寥寥數語，就可以牽引出一連串的歷史故事，揭開一大片深刻的王法道義，令人深深折服而感歎不已。如果不按照它的指引走，就進入不了《春秋》學，因而也掌握不了孔子所要表達的精神意旨。應該說，通過《春秋》，孔子找到了一種把哲學敘事融入歷史敘事中，使天道真理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也更具有感染力的有效方式。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敢於邁入董學門檻，真是無知者無畏，少年氣盛，在對春秋學、公羊學還是一頭霧水、不甚了了的情況下，單單憑《春秋繁露》一個文本，竟敢莽然下筆，雖然能夠淋漓盡致地闡發出董學之中所蘊藏的深刻義理，注重抓住問題本身而只在哲學層面上挖掘董仲舒、闡發董仲舒，把他的思想內容最大程度地彰顯了出來，擴充他的精神體格，進而穩固確立了他在中國哲學史學科領域中不可低估、無法撼動的重要地位，但是，截斷董子思想之來龍去脈，剝離開董學所賴以發生的原始生態，卻不能不是一種遺憾。所以，專門從形上哲學，從信念信仰角度考量、裁剪乃至剖析董仲舒便構成了《唯天為大》一書的基本特點，其完稿距今已經十二年，其正式出版也近十年了。這麼長時間以來，我的研究領域也多有變化，先後在物自身本體論、孔門儒家的忠恕之道、康德哲學、《春秋》公羊學的夷夏之辨等問題中沉思、遊走，而根本無暇顧及董子之學。如今將它重新撿起，緣由大致有三：

首先是因為董仲舒的重要，值得繼續做更為深入的研究和發掘，以引起時人對這位偉大思想家的足夠重視。

儒學史上的董仲舒研究始終都很難與顯學沾邊，甚至，因為演繹陰陽災異容易得罪當朝政權，由此而不招致殺身之禍就已經算是很萬幸的了。近百年來董仲舒研究走的是一段非常坎坷的艱難歷程，從康有為發動“戊戌變法”運動而使董仲舒被竄改、被熱捧，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董仲舒被痛罵、被潑髒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文革”中董仲舒被批判、被指責，再到1980年代“傳統文化熱”中董仲舒被客觀對待而使董學獲得少許相對獨立的學術空間，多災多難的遭遇折射出中華民族近現

代風雲跌宕的政治史、革命史、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又即便在儒學研究內部，現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上承韓愈、朱熹的道統觀，立孔子為教主，依託《論語》、《孟子》、《中庸》、《易傳》而重建儒之道體大本，發揮宋儒的內聖心性之學，撇開漢代經學，捨董仲舒而不取，致使董學被視為雜儒、旁支。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長期以來董仲舒的名氣很大但研究者很少的極不對稱狀況。

董仲舒的思想廣博而深邃，具有極強的穿透力和深遠的影響力，“說不完的董仲舒”永遠值得後人做進一步的挖掘和研究。董仲舒援引陰陽家、五行學、道家、法家、墨家、黃老之學而入儒，借助外道而不離本宗，其開闊的理論視野和寬廣的學術胸襟、其創造性的轉化手法都值得當代哲學人在建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哲學”時所取法和借鑒。孔子之後，還沒有哪一位儒學思想家能夠像董仲舒這樣提出那麼多深入人心甚至對整個中華民族靈魂塑建起到重要積極作用的觀點和理念。諸如“大一統”、“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任德而不任刑”、“仁在愛人、義在正我”、“屈君伸天”、“終始轉移”之類的主張，你可以不信服、不接受，但你卻不能否認，你已經知道它們、瞭解它們的最初來源，因為它們早已融入了無數代中國人的公共話語系統，而成為一種普遍的常識。董仲舒的思想不僅屬於儒家，更屬於中華文化、中華民族。說董仲舒是“中國的康德”，因為他非常真切地建構了中華帝國精神世界的一個分野，在他之前與在他之後，我們的民族心靈呈現出不同的基本格局。所以，孔子、董子、朱子成了儒學發展史上的三大標杆。

董仲舒是中國儒學史、思想史上罕見的具有論證氣質和思

辨品格的偉大思想家。在我看來，董仲舒應該算得上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因為在他的著述裏，每一個命題都是建立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而提出來的，董仲舒從不故弄玄虛，也從不拋出一句沒有經過論證的話，更不是那種只善於向人們頒佈“應當命令”的道德說教家。借助於陰陽、五行的規則性運轉，董仲舒把“人副天數”、“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三綱”、“五常”、“任德而不任刑”、“終始轉移”等思想觀念一一用自己獨特的話語系統做了詳盡周到的推演與描述，不厭其煩，分析得相當透徹，邏輯性很強。

其次是因為當初我所指出的董學的研究問題今日還依然存在。相對於先秦儒家、宋明儒家、當代新儒家熱鬧的研究形勢，包括董仲舒在內的所有漢代儒家的思想研究還處於一種冷門、邊緣化的狀態，主要體現在漢儒的學術關注度低、內在問題難以引起學術共鳴、研究隊伍小、研究成果少、研究領域仍多屬粗放型，其情境仍然令人堪憂，學界對董仲舒的關注和重視，與董仲舒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形成鮮明的反差依然存在。2009年11月，在河北中共衡水市委、衡水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紀念董仲舒誕辰2200週年暨董仲舒思想國際研討會”上，許多學者都不是研究董仲舒的專家，其發言大多仍還停留在董仲舒思想的定位上，泛泛而談，味同嚼蠟。雖然從1990年代以來董仲舒思想研究已經走上了正常、健康的學術軌道，擯棄了那種粗暴地給董仲舒戴上“唯心論”、“形而上學者”、“先驗神學論”、“封建迷信”、“封建專制衛道士”之類帽子的簡單化、意識形態化的處理方法，許多學者都能夠以一種理性、平靜的心態對董仲舒做科學、客觀、公正的研究，有的老專家嘔心瀝血考訂章句，為董學研究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也有青年學者運用新的詮釋方法，發前

人所未發，開闢董仲舒思想研究的新境地，但是，其質量仍然不能令人滿意。董學內部的許多具體內容、核心要素根本就沒有獲得展開，董子是如何推進儒學成為國教、如何催生漢代學術運動的等問題仍然遮蔽著。沒有弄清楚董仲舒是如何利用陰陽五行學說而改造儒學，習慣於用宇宙論、人性論、目的論、辯證法的框框來套解董仲舒思想體系的，大有人在。

實際上，今後的董學研究領域還應該有所拓展，在董仲舒宗教、神學思想研究方面，我們不能因為過去董仲舒被錯誤地扣過一頂“唯心主義神學家”的帽子就乾脆回避對董學宗教性和神學性的研究。董仲舒的思想具有非常強烈的信念、信仰指向，把董學概括為“天學”，強調無論君臣民衆都應該祭天拜天，也未嘗不可，因為董仲舒自始至終就相信一個“天”字，人世社會的任何東西都能夠並且應該從天那裏找到自己的源頭。現代人不相信天，不對天保持一份敬畏的心情，鬥天鬥地，濫砍濫伐，胡作非為，縱欲放蕩，無誠無信，不忠不孝，結果只能導致天候紊亂、社會失序、禍害無窮。

最後則是因為我自己近些年沉下心來讀《春秋》、讀《公羊傳》而不斷有新的收穫。現回過頭去，重新檢視一下董仲舒，卻發現當代學者，包括我在內，似乎還沒有真正讀懂過他。儘管《春秋繁露》的文本究竟是不是董仲舒本人親撰，還一直存在爭議，但誰要想真正讀懂它，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說《公羊傳》與《春秋》已經隔了一層，那麼，《春秋繁露》與《公羊傳》則又隔了一層；而從《春秋繁露》重返《春秋》經，則又遙遠了許多。蘇輿在《春秋繁露義證》中，幾乎對董仲舒親撰或其後學竄入的文字的每一句話都做了認真的注解，但其字面含義所能夠

達到的還只是隔靴搔癢，霧裏看花；其內在深意，則似乎若即若離，而與我們有隔。至於董仲舒學術對漢代以及整個中國文化究竟是如何發生那麼大的作用與影響的，則更為我們所茫然了。於是，在深度挖掘了哲學層面的豐富義理、著力撐開了董子的巨大思想氣量之後，再折回傳統經學的理路和脈絡，聚焦於董學詮釋《春秋》的義理、法統、屬辭三大方面，努力把董仲舒歸還於春秋學的譜系中，則一定會有更大的收穫。

目前學界的董仲舒研究，一般總在兩大脈絡裏進行。一條脈絡是走傳統經學的路徑，身處歷史學科的學者們多關注於董仲舒對《春秋》公羊學的繼承與發揮以及董子春秋學の後世傳續，強調不能對董學做宰割性的分解和剖析，而應該做原生態性的研究，不能跳出經學脈絡去任意發揮董仲舒思想的意義。董子著述的文本、董子的生卒年份考證也屬此脈絡。而另一條重要脈絡則完全是走純粹學理化的路線，身處哲學學科的學者們往往青睞於董仲舒思想的深刻精髓，不再滿足對命題作粗線條的定性交代、不明就裏的泛泛言說或經學系統裏現存的意義框架，而試圖弄清董仲舒之所以提出一個個思想命題的內在機理與邏輯原因，進而闡發出董仲舒思想更悠遠深邃的意義，努力為董仲舒思想在哲學學科和形上領域裏佔領一塊本該屬於它的高地。實際上，這兩條脈絡應該是一種並存、互補的關係。董學研究中，歷史敘事與哲學敘事應該各自發揮自己的所長，相互借鑒，相互幫助，而不應該相互打架，更不應該彼此菲薄、指責和攻陷。畢竟，離開哲學敘事的歷史敘事，則一定會拘謹、僵硬而缺乏思想的牽引與拉動；而拋棄歷史敘事的哲學敘事，則顯得抽象、乾癟而難接地氣。

甲 卷

《春秋》大義與“六科十指”

“春秋”一語可能是上古官方史冊之通名，孔子之後纔逐步演變為一個專名。周予同說：“《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偏舉四字以為書名，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以包‘夏’‘冬’。”^①楊伯峻說，“古人於四季中，較多的重視春、秋二季，所以經常把‘春’‘秋’二字連用”^②，因而總以“春秋”簡稱指代一年四季，後來則逐漸引申為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歷史記錄，忠實、刻板而類似於一本流水賬，為歷朝史官所書寫、撰作。《漢書·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其言、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③原來，《春秋》之為書，並不是普通百姓誰想寫就可以寫的，而是由朝廷所供養的專職人員（“左史”、“右史”）所做出的工作成果，其性質當屬於官方作品。其功能則在於，一是記錄發生於國族的、重要的人物事件，將其一一保存為歷史檔案；二是勸勉帝王謹慎言行，不可信口雌黃、輕薄而為，否則便會留下千古罵名。

① 朱維鈺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群經概論》，第25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第4頁，中華書局，1990年，北京。

③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763頁，岳麓書社，1994年，長沙。

唐代劉知幾《史通·六家》篇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可惜誰都沒有見到過《夏殷春秋》之書，而只是一種純粹的主觀推斷，至於“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①，則更難讓人信服。現存《春秋》是一部脫胎於春秋時代魯國史記的編年體史書，相傳經過孔子編輯、整理、修訂後，隨各種傳授本流行下來，而被後世儒家奉爲特別重要的經典。其記事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合計二百四十二年，經歷了魯國十二公。因爲其形式是“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②，也被人們視爲編年史的濫觴。《論語》一書中，並沒有記述孔子作《春秋》之事，甚至連寫就於戰國初年的《商君書》，大肆攻擊儒家的《詩》、《書》、《禮》、《樂》經典，卻隻字未提《春秋》。所以，在先秦許多學派的那裏，究竟有無《春秋》一書，還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

一、《春秋》種種

周王東遷之後，諸侯勢力日盛，許多封國爲了完整記錄和保存本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宗廟等活動，都策劃編纂屬於自己的《春秋》。很可能，“春秋”只是一個泛稱化的書名，各國應該都有自己的《春秋》典冊。《國語·晉語七》中，司馬侯對晉悼公說：“羊

① 劉知幾：《史通·內篇·六家》，第12頁，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臺北。

② 杜預：《春秋左傳·序》，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一三七·春秋類》，第143—1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臺北。

舌舐習於《春秋》。”^①《國語·楚語上》記，申叔對太子傅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②在當時，《春秋》一書似乎已作爲規勸貴族子弟行善止惡的有益教材。《墨子·明鬼下》篇中，已經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和“著在齊之《春秋》”^③一類的記載。《隋書·李德林傳》甚至還說，墨子自稱“吾見《百國春秋》”（可惜，今本《墨子》無此句）。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中：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

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④

而今存《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亦說：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⑤

① 晉悼公問：“何謂德義？”司馬侯回答說：“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晉悼公又問：“孰能？”司馬侯於是纔首先推薦了精通《春秋》的羊舌肸。於此可見，《春秋》之書，無論屬於哪國、出自誰家，都以弘揚道德仁義爲主旋律。引文見《國語·晉語七·司馬侯薦叔向》，第126頁，岳麓書社，1988年，長沙。

② 李維琦標點：《國語·楚語上·申叔時論傅太子》，第151頁，岳麓書社，1988年，長沙。

③ 《墨子·明鬼下》，見《百子全書》，第三冊，第2428—2430頁，岳麓書社，1993年，長沙。

④ 參見《韓非子校注·內儲說上·七術·說二》，第31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南京。

⑤ 顧馨、徐明校點：《春秋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第56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瀋陽。

比較《七術》與僖公三十三年的《春秋》文字，我們便大致可以推斷，魯哀公當時所閱讀到的《春秋》應該就是沒有經過孔子修訂過的《魯春秋》，而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差別不大。孔子本人無疑也是讀過《魯春秋》的，否則，他就回答不出、也解釋不了魯哀公所提出的“實霜，不殺菽”問題。但孔子未必就是今本《春秋》的原始作者^①。

而從先秦時期人們說話、寫作時的習慣徵引，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清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凡所引，皆古人、前人或別人之語，而不太可能是自己的話。這樣看來，《禮記·坊記》篇假託孔子所說的兩段話，似乎也很能說明一點問題的實質：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

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蔔之。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②

① 胡安國甚至直接就把今本《春秋》等同於《魯春秋》。“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見《春秋胡氏傳·春秋傳序》，第1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杭州。這裏，“史外傳心”是肯定的，但《春秋》與真正的魯史則還有一定的距離，不能混同。

② 陳戍國點校：《禮記·坊記》，第488、492頁，岳麓書社，1989年，長沙。